

緒論

一

在上一本書《離散》的最後一章，我討論了文化記憶。在我看來，「有些記憶超越個人與社會，可以被視為某種文化現象。」我接着指出，「文化記憶應該是鮮活而生生不息的，並非過去的紀錄、檔案或遺跡而已；文化記憶不僅將不同世代的人聯繫在一起，其實也聯結了一個種族、族群、社群或國族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李有成 2013：128）。文化記憶屬於集體記憶，強調的不是記憶的完整性與正確性，這些記憶不是關於過去的知識，而是來自過去的知識（Margalit 2003: 14）。這是某些文化可以不斷垂直綿延、平面擴散的重要原因。《離散》最後一章有一節特地以媽祖信仰為例，析論文化記憶如何見證媽祖信仰的離散層面，如何將福建、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閩南離散社群連結在一起。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底，我到東京明治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會後特地跑了一趟離東京不遠的橫濱。我在橫濱的中華街附近看到一座富麗堂皇的天后宮。二〇〇六年這座天后宮開廟時，受邀前來指導安座大典的是臺南天后宮的代表，整個事件的象徵意義很值得玩味，至少其背後所涉及的文化記憶使我對閩南信仰文化的擴散又多了一些體會。文化記憶的傳遞與家庭或世代未必有關，其所仰賴的主要是各種建制性的象徵系統，寺廟或信仰只是其中之一。

文化記憶無疑是記憶很重要的一個面向。記憶在當代理論中是個非常複雜的課題，不待佛洛伊德介入這個課題的討論，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在其名著《懺悔錄》（*Confessions*）中早就告訴我們：

記憶……就像一片廣大的田野或者一座巨大的宮殿，一座儲藏着無數各式各樣由感官知覺傳送而來的影像的倉庫。這座倉庫也貯藏着所有我們透過感官知覺而增減修飾的思想，同時也儲備着任何我們付託保管的東西，直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被吞噬且被掩埋遺忘為止。（Augustine 1973: 214）

聖奧古斯丁的話說明了記憶與情感和情動（*affect*）之間的關係，當他以「增減修飾」之類的字眼描述思想與感官知覺之間的互動時，他其實也在暗示記憶是如何紛陳雜亂，甚至如何渺不可及。記憶無所不在，不過記憶又多半零碎、隱匿，乃至於行蹤成謎，重建記憶的過程因此繁複而曲折。

記憶有時隱含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那是屬於政治潛意識。回憶，當然是在回憶的內容已經消失之後。這些內容以記憶的面貌存在，但記憶的面貌支離破碎有如上述，在重建記憶的過程中，要選擇什麼，要如何選擇，甚至如何重建，又要重建些什麼，在在涉及複雜的記憶政治。以極為仰賴記憶的自傳而言，在現代理論的觀照下，記憶也從聖奧古斯丁所說的庫房變成自傳最大的問題：記憶必須經歷文本化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因受到語言修辭的中介，自傳文本中的記憶與原先從庫房中選取的記憶已經大不相同。因此我們看到的只是潛伏於文本中的記憶——隱晦、流動、曖昧，而且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遭到修飾，抹除，甚至遺忘（李有成 2006：40-41）。任教於倫敦大學的澳洲學者薛葛兒（*Lynne Segal*）在她發表於《新構成》（*New Formations*）期刊的一篇論文中，對這個現象也有類似的反省。她說：「記憶是個脆弱的東西，對所有的幻覺與自欺——不管是有意識或無意識——都脆弱無比。……今天的箴言是，沒有記憶會缺少遺忘，沒有遺忘會缺少記憶」（*Segal 2009: 121*）。

有記憶就會有遺忘，遺忘不表示記憶並不存在，正好相反，遺忘其實反證記憶的存在，兩者環環相扣，彼此依附，互為表裏。一九九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非裔美國作家摩里森（*Toni Morrison*）稱這種現象為再記憶（*rememory*）——她用的是名詞。在她著名的小說《寵兒》（*Beloved*）中，女主角柴特（*Sethe*）對女兒丹佛（*Denver*）解釋何謂再記憶。柴特就是靠着再記憶，才有可能重建她的故事。她說：

「……有些事一去不復返。有些卻久留。我以前認為那是我的再記憶。你可知道，有些事你會忘記，有些你永遠也忘不了。其實不然。那

些地點，那些地方依舊存在。倘若一幢房子燒掉了，它就沒了，但是那個地方——它的樣子——依舊存在，不只存留在我的再記憶裏，而且還存留在這個世界上。我所記得的一幅畫面，漂浮在我的腦海之外。我的意思是，儘管我不去想它，儘管我不在人間，我的所作所為或所知所見的那幅畫面還是留着，就留在它原來發生的地點。(Morrison 1987: 36-37)¹

柴特用了一個相當鮮活的意象——房子燒燬了，不再存在，但房子所在的地方卻依然存在。再記憶指的不單純是個人的記憶而已，而是近乎我們常說的集體記憶，因為再記憶往往為許多人所共有。以柴特的經歷來說，身為黑奴的記憶並不會因蓄奴制度的廢除而消失，因此即使未曾經歷蓄奴制度的人也不難想像或體驗此制度的存在。柴特面對這種再記憶的窘境是：她既想忘記被迫為奴的創傷，卻又無法擺脫身為黑奴的恐怖記憶——房子不在了，可是那地方還在（另請參考本書第六、七章）。

這裏還涉及與記憶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議題，即記憶與創傷的關係。這也是晚近創傷理論很重要的一部分。現代創傷理論始於納粹對歐洲猶太人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研究（Kaplan 2005: 1）。大屠殺發生在個體的層面，但卻是個集體的悲劇——這個種族清洗的事件固然屬於猶太人的苦難，其意義卻是普世性的。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一書所指出的，「大屠殺不僅是猶太人的問題，也不是猶太歷史中的某一事件而已。大屠殺發生與完成在我們現代理性的社會裏，在我們的高階文明裏，在人類文化成就的高峰上，基於這個理由，大屠殺因此是這樣的社會、文明及文化的問題」（Bauman 2000: x，強調部分為原文所有）。對人類社會而言，大屠殺所造成的創傷因此具有更深廣的啟示。

這個創傷既是個人的（包括家庭和家族），也是集體的（包括整個社群和種

¹ 主要根據何文敬的翻譯，為行文需要，譯文曾稍作修飾（童妮·摩里森 2003: 44）。

族)，這種大規模的創傷其實原本就很難區分個人或集體，而且由於規模太大，這樣的創傷往往讓人瞠目結舌，因此常被說成「難以言宣」或者「無法想像」（Edkins 2003: 2）。在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一本小說《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裏，主要角色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長崎原爆的倖存者，他們不僅被原爆發生時恐怖的毀滅性現象嚇壞了，原爆留下的創傷更迫使他們極力想要遺忘，至少避免回憶這個慘痛的經歷。悲劇過於龐大，過於深遠，顯然難以名狀，已經超越語言所能表達（請參考本書第一章）。除發生在像大屠殺這類種族絕滅事件外，大規模的創傷也可見於戰爭、流亡、殖民鎮壓、恐怖攻擊、自然災變、生態惡化、政治與宗教迫害等災難，在這些災難中受創的除了事件的倖存者外，也可能包括倖存者的親人或後代，而這些親人或後代日後往往變成這些創傷記憶的守望者與捍衛者。除此之外，當然還有比較屬於個人層次的創傷，譬如各種形式的家暴、性侵、霸凌、歧視等所造成的結果，對受害者而言，這些都是難以磨滅的傷痕。不論出於驚嚇、迷惑，或其他負面反應，創傷對個人或集體都是令人困擾不已的歷史殘留（Roth and Salas 2001）。記憶正好體現這些歷史殘留。在這種情形之下，用閻連科的話說，「記憶成為了一種生存和生命，不光是一種時間和事物」而已（閻連科 2014：21）。

李永平的小說集《雨雪霏霏：婆羅洲的童年記事》一如副書名所示，是一部有關記憶的書。整本小說集是以九篇「追憶」的文字集結而成，這些「追憶」泰半又與創傷有關，用李永平自己的話說，「追憶」中所敘述的都是小說敘事者「心中最深傷疤的一則則童年故事，和故事中一個個受傷的女子，就如同一群飄蕩不散的陰魂，只管徘徊縈繞我腦子裏」（李永平 2003a：31）。在《雨雪霏霏》的九篇「追憶」中，終篇的〈望鄉〉不僅將個人與集體的創傷和記憶重疊結合，同時也緊密地把臺灣與婆羅洲連結在一起，而在這則「追憶」中讓臺灣與婆羅洲產生關係的則是日本：這則故事涉及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記憶與日本南侵的戰爭記憶。

這篇「追憶」取名〈望鄉〉顯然受到同名日本電影的啟發。電影《望鄉》由

田中絹代主演，敘述太平洋戰爭前一群日本女人被浪人誘拐到英屬北婆羅洲山打根出賣靈肉的故事。李永平的〈望鄉〉部分情節與電影的故事類似，說的也是女性受騙的故事，只不過背景換成了太平洋戰爭期間與其後，而敘事者所說的三個奇女子都是臺灣人。其中一位名叫月鸞。敘事者這麼回憶月鸞的遭遇：

十六歲那年夏天，地方上有位紳士忽然帶著兩個身穿白西裝、頭戴黃草帽的日本浪人，搭乘吉普車，來到她家田庄，自稱是什麼「拓植會社」的幹部，替皇軍招募隨軍看護到南洋軍醫院上班。……月鸞和村裏六個夢想當護士的姑娘出發囉，興沖沖喜孜孜，搭火車到高雄港，跟兩百多個來自其他鄉村的女孩子會合，搭上運兵船，隨同日本陸軍第一百二十四聯隊，……飄洋過海來到了英屬渤泥島。日本人講的渤泥，就是中國人說的婆羅洲。……登陸後，十五位姑娘被分派到古晉皇軍慰安所工作。那是城中一棟巨大的洋樓，上下兩層，底層用木板分隔成幾十個兩席大的小房間，裏頭啥都沒有，只擺一張挺堅固的雙人木床。每個房間住一個姑娘，日夜接待皇軍，從事慰安工作。……古晉慰安所的那群服務生，各色人種的女子都有：朝鮮人、荷蘭人、菲律賓人、英國人……

（李永平 2003b：240-41）

這段敘述耳熟能詳，說明當年皇軍招募慰安婦的大致經過。這段話當然也喚起日本殖民臺灣與佔領婆羅洲的歷史記憶。身為被殖民者，臺灣姑娘就這樣在半哄半騙之下別親離家，遠渡重洋，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充當皇軍的洩慾工具，在太平洋戰爭中被迫扮演她們從未料想過的角色。她們的遭遇構成太平洋戰爭另一個版本的戰爭記憶，她們的故事至今尚未結束，而她們的戰爭經歷更是有待妥善清理。² 顯然，李永平有意藉她們的故事寄託他的後殖民人道批判：這些女人的悲慘命運全然是軍國主義意志下毫無選擇的結果。〈望鄉〉的敘事者大概不會想到，太平洋戰爭結束數十年後，歷史的鬼魅依然杳杳幢幢，他竟然在月鸞的故鄉臺灣

² 有關臺灣慰安婦的研究可參考婦女救援基金會，《臺灣慰安婦報告》（臺北：臺灣婦女救援基金會，1999）與朱德蘭，《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圖書，2009）。最近有一部以臺灣慰安婦為主題的紀錄片《蘆葦之歌》（吳秀菁執導，婦女救援基金會製作，2015），值得觀賞。有關慰安婦較新的英文著作可參考 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追憶滯留南洋的她和她那群姊妹的悲苦命運。³

李永平的後殖民人道批判也坐實了記憶其實是某種形式的行動主義 (activism)，召喚記憶是為了拒絕遺忘，或者抵拒閻連科所說的失記，⁴ 抗議扭曲或泯除過去，目的在糾錯導正，追求公義，讓受污穢的可以抬頭挺胸，讓受屈辱的可以獲得安慰，藉此重建人的尊嚴，並盡可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賀琦 (Marianne Hirsch) 即在反省她何以從女性主義研究轉向記憶研究時表示，像女性主義的藝術、書寫及學術一樣，她堅信：

記憶研究提供一種揭露與重建經驗和生命故事的方式，這些經驗與生命故事原本很可能在歷史檔案中消失殆盡。作為一種反歷史形式，「記憶」提供我們理解造成忘記、遺忘與湮滅的權力結構的方式，因此記憶也介入種種修補與矯正的行動。記憶確保在嚴厲的司法霸權結構之外倡議各種形式的正義，同時代表某些生命與故事尚未受得關注的個人與群體提出主張與行動主義。(Hirsch 2012: 15-16)

在賀琦看來，記憶研究跟女性主義與各種旨在社會改革的活動沒有兩樣，讓行動主義成為學術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學術研究對某些身陷歷史災難的脆弱生命與其所遭遇的創傷始終關懷備至 (Hirsch 2012: 16)。記憶因此在文學和藝術生產中經常隱含政治意義，不應該僅僅被視為單純的生理、心智或意識活動而已。記憶是具有導正視聽、糾正不公或伸張正義的形式與活動。上舉李永平的小說是個明顯的例子。

李永平的小說敘事所仰賴的主要為賀琦所說的後記憶 (postmemory)。^{〈望鄉〉}

³ 上述有關〈望鄉〉的分析主要引自本人的〈歷史的鬼魅：李永平小說中的戰爭記憶〉一文 (李有成 2015: 243-46)。

⁴ 閻連科所指的失記包含了「對現實與歷史有選擇的拋去和留存」，甚至還包含「今天對記憶的新創造」，目的在「讓新一代的孩子們，成為記憶的植物人」(閻連科 2014: 11)。他進一步表示，「失記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之特徵，而是國家管理的策略和社會制度的一種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在意識形態中實行禁言的政策和方法；通過權力的控制，割斷一切可能延續記憶的管道，如史書、教材、文學和一切文藝的表現與表演」(閻連科 2014: 14-15)。失記不僅發生在集權與威權統治的社會，也可能為民主政權所利用，如日本右翼政權多年來企圖以「大東亞共榮圈」美化其對亞洲大陸與南洋的侵略，同時以各種方式淡化，甚至否認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的存在。

中有關太平洋戰爭期間臺灣慰安婦的遭遇顯然並非直接來自作者或敘事者親歷的記憶。這些記憶大抵傳承自曾經走過太平洋戰爭的父祖輩，或者自市井傳說、文字或影像檔案中取得。換句話說，這些記憶多半都是聽來的，或者蒐集來的，尤其來自敘事事件親歷者的記憶，是世代之間（intergenerational）或跨世代（transgenerational）的記憶傳遞，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社群的、種族的，甚或是國族的，是後世代（postgeneration）所提取的先人遺留的記憶。

後記憶的概念也出於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悲劇，是賀琦在閱讀或觀賞大屠殺罹難者後代的著述、繪畫、攝影或電影之後所構思的概念，她以之統稱這些後代創作中所仰賴或依據的創傷與苦難記憶。後記憶即成為大屠殺受難者後代的主要創作基礎與泉源。依賀琦的說法，後記憶的本質是這樣的：

「後記憶」是在描述「後面世代」與前面世代的關係，這些關係涉及前面世代個人的、集體的及文化的創傷——他們只能藉由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所耳聞目睹的故事、影像及行為來「記住」這些經驗。只不過這些經驗是如此深沉、如此動人地傳遞到他們身上，最後似乎成為他們自身的記憶。因此後記憶與過去的連結其實並非經由回憶的中介，而是經由想像、投射與創作。……不管是如何間接，後記憶將由造成創傷的片段事件所形塑，而這些事件尚有待敘事重建，並且超乎理解之外。這些事件發生在過去，其效應卻延續到現在。我相信這就是後記憶的結構與其形成的過程。（Hirsch 2012: 5）

後記憶並不同於一般定義的記憶，其理自明，因為後面世代不可能親歷前面世代的創傷與苦難。如前所述，後面世代只能藉由口說、文字與影像檔案「重溫」其父祖輩的慘痛遭遇。後記憶之所以是「後」，正是這個道理。賀琦因此強調，後記憶是以其「情動的力量與心理的效應」（Hirsch 2012: 31）來理解與重建記憶的——記憶只是後記憶的材料，記憶必須透過象徵性系統在後記憶中展演與流傳。

後記憶是個相當有用的概念。《記憶》這本書裏有不少章節所處理的記憶都與後記憶有關（請特別參考本書第一、四及五章）。在這些章節裏，後記憶看似存在於個人或家族的層面，其實後記憶仍處處展現其社會或集體意義，因此也被視為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對後面世代而言，後記憶的意義主要在捍衛，保存與延續前面世代的記憶。賀琦在構思後記憶的概念時，原來只是基於其家人為納粹迫害的經驗，這個概念後來經過演繹與擴展，開始具有社會與集體的個性。由此看來，藉由後記憶重建先人的悲慘記憶其實也是一種紀念或傷悼的儀式（Gibbons 2007: 76）。

二

《記憶》一書基本上延續我在《他者》與《離散》二書的論證形式，書中的主要關懷是他者或離散者的個人或族群經驗，這些經驗透過敘事——小說或傳記——或直接或間接，或明晰或隱晦，以不同形貌的記憶被保存下來。記憶的內容繁雜，個人之外，還牽涉到殖民、戰爭、蓄奴、冷戰、種族歧視等的歷史記憶。在我的論證過程中，這些記憶始終保有強烈的行動主義的色彩，反映的也是我念茲在茲的學術的淑世意義。

《記憶》除〈緒論〉與〈餘論〉外，全書共分八章。第一章討論的是石黑一雄的小說《群山淡景》。這本小說的主要角色都曾經身歷長崎原爆與日本戰敗，對那段歷史可謂記憶猶新，但他們卻態度曖昧，有時候甚至刻意迴避這段歷史經驗。我們在小說中不難發現，當前面世代在創傷中漸漸與過去取得和解之後，後面世代則希望了解與保存前面世代的記憶。

第二章主要在析論謝柏德（W. G. Sebald）在《土星之環》（*The Ring of Saturn*）一書中所說的「過去諸多毀滅的痕跡」。書中的敘事者沿着英國東部的北海之濱旅遊，他在旅途中處處發現這些過去的痕跡，在感歎時間的毀滅性之餘，也觸發了他對歷史的憂鬱思構，包括他對德國二戰歷史的省思與對戰爭記憶的傷悼。當

石黑一雄筆下身歷長崎原爆的小說人物想方設法避談戰爭記憶時，謝柏德的敘事者則刻意打破沉默，反省歷史遺忘與緘默的問題。

第三章探討後帝國倫敦的空間分佈問題，在古雷希（Hanif Kureishi）的小說《郊區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中，這些問題或多或少涉及移民、家園、歸屬感等的離散意義。這一章雖然並未直接詳論記憶，但是上述的諸多問題莫不關係到殖民記憶與帝國遺緒，至少必須擺在這樣的脈絡來了解。

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以趙健秀（Frank Chin）的兩本小說考察族群的歷史與文化記憶，重點在了解這些歷史與記憶如何因建制性的種族歧視而遭到泯滅或扭曲的命運。在其第一本長篇小說《唐老亞》（*Donald Duk*）中，趙健秀透過華裔美國少年唐老亞的再記憶與後記憶，重新追溯華裔先民參與建築北美橫貫鐵路的歷史記憶，並在此追溯的過程中展演其津津樂道的華人英雄主義，目的無非在對抗美國強勢種族與文化的建制性歧視。趙健秀的另一本長篇《甘卡丁公路》（*Gunga Din Highway*）則以略帶後殖民主義的語言批判強勢種族與文化如何壓制華裔美國人的自我再現，這樣的關懷最終不免與族群文化記憶的重要內容密切相關。

第六與第七章則轉向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第六章討論的是蓋慈（Henry Louis Gates, Jr.）的回憶錄《有色人種》（*Colored People: A Memoir*），並旁及非裔美國人的自傳傳統。這一章特別強調蓋慈如何視美國黑人自傳為一種見證，一種生命書寫，記錄的是非裔美國人在新大陸的歷史記憶。對非裔美國人而言，這些記憶記載着其先人血淚斑斑的苦難與抗爭。第七章所析論的《十三種觀看黑人男性的方法》（*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 Man*）是蓋慈為八位當代著名非裔美國菁英所作的側寫（profiles），這些菁英也被視為黑色美國社會的楷模（representative men），肩負着黑人種族與社會的期望。這些人所具現的是世世代代黑人菁英階級所背負的文化記憶。

最後一章的重點在閱讀歐大旭（Tash Aw）的小說《沒有地圖的世界》（*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在這本小說裏，歐大旭明顯延續其在《和諧絲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中對歷史記憶的關懷，企圖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提供一個批判性的視角，召喚我們對美國介入亞洲事務的記憶。在冷戰結束之後，時間的距離讓歐大旭能夠更為從容地重述冷戰時期，在強權的干預下現代東南亞歷史中尚待認真清理的一段插曲。